



“中华文明探源·何以中国”之发现篇④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文明探源·委员漫谈

# 石峁，相隔千年宛如初见

## ——专访石峁遗址考古队领队、陕西省政协委员、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

本报记者 司晋丽

# 不断的追问

叶小文

习近平总书记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

限于专业所限，我以前对考古并没有太多的了解。直到今年全国两会闭幕后，我们在全国政协委员读书群里开启了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讨，这也是我第一次如此深入地了解到考古的魅力。文明探源意义重大，然而，要拿出实证，则必须通过考古学家手中的武器。

王巍、袁靖、王震中等专家在读书群里现身说法，令大家了然，正是通过考古挖掘，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这些“明星遗址”，得以穿过历史尘埃，来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得以一睹先人之貌。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不只有灿烂的群星，还有不灭的人间烟火，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独有的馈赠。

在读书群中，有读者提问：“新石器时代，以农耕为基础的满天星斗、重瓣花朵的区域文化，为什么最后明月星稀，只有二里头文化一枝独秀？”

群里书友认为，这是个“大哉问”，极为深刻，需要深究。因为这一问题不仅涉及中华文明的起源，而且也涉及中华文明的发展为何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一石激起千层浪，书友讨论纷纷。集各位高见，我认为，中国“大一统”传承的“一元”基础，也可以说，正是接地利、应天时、顺人和——地利天时人和。

“地利”，概括地说是一条长江、一条黄河，尽管奔腾千年、时而泛滥甚至改道，但一直孕育着、紧系着中华民族，这是不争的事实。顺着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扩展开去，拉住长城内外（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都向着生产方式相对更先进的一端融合），走向大海大洋（顺流而下，进入南海、东海，深入太平洋）。所以，讲一元多样之“元”，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长江黄河，乃是承载中华文明“地利”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

如果“地利”是“形而下”的，“天时”就是载于“地利”之上的大趋势、大规律，是“形而上”的。

正是气候环境变化，人类为了生存必须从森林走向农耕，人类文明就开始萌生了。青铜器极大地提高了农耕的生产力，二里头文明就诞生了。我认为，接地利、应天时，必致“顺人和”，即中华文明“始于一元多样，归于多样一体”，也即中国“大一统”传承的“一元”文化基础。

最新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不断拓展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历史脉络的认知。中华文明距今5000年到4000年期间形成的各区域文明自发展交流共荣，转变为中原王朝引领的一体化性进程，展示出多源汇为一体的发展路径。面向未来，继续推进、不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过程，需要在考古实证的基础上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理论分析。同时，关于不同时期的文明发展历程还有许多谜题等待破解，尤其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特征还有待深入研究。只有在不断的追问中，我们才会距离真实最近。

这期“中华文明探源·何以中国”系列报道所展示的陕西石峁考古就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个缩影。在石峁，我们不仅感受到北方远古老城址的雄峻，更能体会到不同文明的交融交汇和兼收并蓄，在文明的涌动中，感通古今，追本溯源。收录石峁考古过程和资料的陕西考古博物馆是唯一一个以考古学命名的博物馆，对考古学理论方法，以及文物保护和重要考古发现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展示，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参观遗址，一定不要忘记造访这个考古博物馆。

中华文明“始于一元多样，归于多样一体”。把“一元”的圆心固守住，把包容的多样性（多线性）半径尽量拉长，画出最大同心圆，永固中华儿女大团结！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 “北方最大的一座城址”

对个人来说，要完整保存几十年的记忆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然而，有些文明却已经在中华大地上漫游了几千年。

位于陕西榆林神木市高家堡镇的石峁遗址就是这样一种存在。这座城址初建于公元前2300年前后，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距今已有4000多年，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城址，被誉为“石破天惊”的重要考古发现。

来自4000多年前的一枚枚玉器，通过考古学家的手铲，从黄土古道走来，与今人照面。它沉默不言，却是几千年朝代更迭、疆土变迁的见证者。这，令人对中华文脉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和敬畏。



更多报道见  
人民政协报  
微信公众号

记者：石峁遗址被誉为“中国文明的前夜”。乍一听，这是一个距今4000多年的史前文明，但如果用夏朝建立的前夕这个方位来表述，就亲近多了。这样一想，好像穿越4000年也如电光石火一般，并不遥远。

孙周勇：一眼千年，这正是考古的魅力所在。考古学是一个不断发现的学问，是通过物质资料来说话的学科，通过实实在在的文化遗迹或者文物，不断地更新或者纠正着人们原先对于历史、对于文明的认识，这些实物连接着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让人感受到新奇、不可思议的同时，又对我们一以贯之的中华文明充满自豪感。

记者：您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加入石峁遗址考古工作的？可否大致梳理一下这项工作走过的历程？

孙周勇：作为陕西人，又是考古科班出身，我早就开始关注石峁了。石峁考古调查工作全面启动是在2011年，由我担任领队。自2012年开始持续大规模发掘后，我们首次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对遗址残存城墙的走向进行了测绘，确认了石峁遗址是以“皇城台”为中心、内城和外城以石砌城墙为界的一座罕见大型石头城，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皇城台具备了早期“宫城”的性质，发现有玉器、石范、壁画等象征身份等级的“奢侈品”，以及铸铜、制骨等早期“核心技术”催生的生产遗存，这些实物为我们勾勒出当时石峁的“王”和高等级贵族们在台顶近8万平方米的空间生活的场景。2012年，我们公布了外城东门址考古新资料，这处有着两重城垣、规模宏大的史前城址，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关注。现在，皇城台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

石峁遗址的考古挖掘是几代人集体性的成果。放在陕西考古、中国考古的历史中，每一代人都只是很小的一个片段。早在1958年，考古学者就首次关注到石峁遗址。从1976年开始，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几代人就几乎没有停止过在遗址上进行调查、勘探、发掘、研究，才形成一张比较宏观的图。很多上级领导到陕西省考古博物馆考察时，我都会讲解说，挂在墙上的一张图、图上的每一个点背后，都有一群人在那里工作了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

记者：那么，石峁城址建于距今4000多年前，这个时间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推测的？

孙周勇：2010年，当时的神木县向陕西省文物局报告，说石峁遗址发现了大量玉器、陶器等文物。

从消息推测，我想这个地方肯定非同一般。我们团队也几次到遗址去考察过，看到了后来被确认为城墙的石墙。但刚开始为什么没能认定这是一座石城？因为石墙是断断续续的，加之过去大部分学者认为石墙包括皇城台一些护墙，可能是战国时期秦长城的附属设施，谁都没有推测到会是城墙。转折点是2011年我们进行的大规模考古调查。我们把整个区域10多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跑遍了，然后绘制成一张图。当把石墙和龙山时期的遗物匹配到一张图上以后，发现有一个高度的吻合，直观判断它应该是龙山晚期的一座城，如果确认的话，将是整个北方地区最大的一座城。后来也是通过与龙山文化时期的典型遗物相关联对比，判断到石峁遗址能追溯到4000多年前，也就是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国所建规模最大的城址。一些学者还从聚落和社区的层面进行了相关研究，甚至上升到文明或国家起源的高度，认为石峁可能已经进入早期国家的发展阶段。

记者：跑遍10万平方米，一定是个艰辛漫长的过程吧？

孙周勇：“广大考古工作者风餐露宿、青灯黄卷”。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画面。现在回想起当时还是略带心酸的。1996年我们去榆林考古，虽然在一个省内，但铁路还没有通，我们开一辆吉普车，一走就是三天，忍饥挨饿也是常事。后来，我国第一条沙漠高速——榆林到靖边高速公路开通后，我们就坐一晚上大巴车，历经十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到了开始工作。即使在考古发掘工作大规模启动早期，考古队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依然很艰苦，没地方住，就住老乡家废弃的窑洞；没水喝，就喝窑水；手机信号基本不通。现在的条件不可同日而语了——西安到榆林的航班每小时就有一趟，和公共汽车一样便利，开车的话6个小时就能到达。遇到野外一些复杂路况，普通车辆到不了的地方，可以租辆越野车。我们还在当地建起了自己的办公室。

### 在文化的交流中体现了“多元一体，兼容并蓄”

记者：近年，随着文博类综艺节目的播出，让文物开口“说话”成了一个流行的现象。如果您要选择一种能代表石峁的文物，就是您会选择哪一种？

孙周勇：倘若在石峁发现大量的石磨之前，我首选的肯定是1976年发现的一批27件牙璋，这个牙璋被认为可能是后来流行在东亚地区的牙璋的雏形和发源地。现在，我会选择皇城台的石磨。石磨原本

重要遗迹，由内外瓮城、南北墩台、门塾等设施组成，周边地层及遗迹中出土了玉铲、玉钺、玉琮、牙璋、陶器、壁画和石磨头像等重要文物。

外城东门一带石墙内埋葬玉器的现象尤为引人注目。根据其出土状况分析，这些玉铲、玉钺、玉琮等器物应是城墙修建过程中有意嵌入墙体的。石磨遗址所见将玉器置于墙体之内的现象，或符合上古文献或神话中提到的玉门、瑶台、璇门的相关记载。作为石峁人在信仰层面的驱鬼辟邪观念催生的精神武器，石磨外城东门址所见杀戮奠基及墙体藏玉现象，极

是大型宫殿上的装饰，营造出一种比较有仪式感、威严、震慑力的氛围。受疫情影响，目前实地参观还不是很方便。《人民政协报》的读者感兴趣的话，可以先在网上找一些图片看看。石雕的图案分几种，有一种典型的面面型图案石磨体量庞大，形象也特别丰富；第二种是似兽非兽、似人非人的神面状的，有的像饕餮纹，有点儿像良渚的纹饰；还有的是比较写实的，脸部圆润带着笑容，但因为要刻画在石头上，就会被拉长成为近乎方形的，像商代的青铜人面鼎。第三种是阴刻的线条，基本上是一种浮雕的创作方式。艺术创作肯定是夸张化、拟人化的。我们推断，这要么是石峁王国的祖先，要么是英雄一类的人物形象。每每与他们注视，我都能感觉到他们也在看着我，想对今人讲述曾经的一件件趣事，或倾吐往昔的荣耀。

记者：您前面讲到，石雕上的饕餮纹，和良渚的纹饰有些相似。这让我联想到，石峁和良渚的另外一个共同点，都出土了大量玉器。而且据说，这两个地方的玉器还有所相似。这是否说明，在几千年前，不同的文明就在融通、交汇？如果是的话，会通过什么样的介质来实现传播的？

孙周勇：当石峁出现时，良渚文明已经衰落了，这两种文明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正如您所说，我们在石峁看到良渚时期的玉琮，当然这种玉琮已经被改制过了，在良渚是典型的一个天圆地方的柱状，而在石峁时期就被切为薄片了。这说明古人上层社会高等级的礼器或者说奢侈品，交流的网络一直是比较通畅的。石峁处在欧亚草原南端的南端，也是一个交通发达的地段，它汇集了很多文化：有西北方的齐家文化的一些典型的因素，跟陶寺遗址有很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可能跟关东地区、中原地区产生过一定的交集，其实很多文化都能看到类似的现象，一个强势文化在产生形成的时候，会吸收周边的一些文化因素，也就是说，在同一时期，文化之间的互相交流影响是一直存在的。这些年，我们还在皇城台发现了扬子鳄的骨板和一些海贝，现在想来很不可思议！这都是长江流域或者大海里面才有的东西，可是它们竟然很早就出现在西北内陆。所以，从考古发现的角度来说，这体现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讲的“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文化面貌。至于您问我，当时文化交流的工具是什么，究竟是车、马还是船，坦率说我也不清楚，到现在依然是未解之谜。

记者：除了皇城台展示的王和贵族的生活场景外，有没有发现当时普通人的一些生活情况？

孙周勇：我们团队通过植物遗存，分析出石峁的生态特点以农耕生产为主，兼营畜牧业。农作物种类主要包括粟、黍两种小米，豆科植物较丰富，显示畜牧业也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农牧交错带的生产特点也许在当时已经形成，石峁先民已经能够饲养上述动物作为家畜并自给自足地满足日常生活需要。

### 考古就是不断逼近历史真实

记者：石峁人是怎么消失的？

孙周勇：石峁城址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现在还没有确凿的原因。但我们观察到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在大河套区域，就是广义上的北方区域，内蒙古的中南部、山西的西北部、陕西的北部大概10万平方公里这个范围里，从距今4000年前后发展到3800年前后的时候，整个前期遗址里的人突然都消失不见了，石峁人也不例外。一群来自“蛇纹石遗存”的人，占据了石峁人生活的地方。石峁人的消失很可能跟气候变化，或者是资源的日趋紧张、战争因素有关。

记者：石峁遗址也属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部分，这个平台对考古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孙周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几次很重要的工作，包括在关键阶段确定石峁遗址的性质和认定它的价值的时候，都是以探源工程的专家们为主，在现场召开了几次重要的、具有节点意义的会议。记得2012年，张忠培先生、李伯谦先生都说这是石峁古城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会改变我们关于中国早期的一些认知的高度。

记者：中国考古已经走过100年了，您怎样看待这项事业？

孙周勇：我的回答应该跟大部分的学者是一样的，考古发现是在不断地丰富古人社会的真实图像，不断逼近历史真实，但永远不可能完全复原，因为我们通过史书记载看到的往往是后代或者更远的人追溯前代的历史，很少有当代来记录的。所以，“地下这本书”应该是最能够客观真实反映当时社会的真实途径。

## 石峁遗址的几处重要考古发掘

### （一）皇城台

皇城台的考古发掘始于2016年，目前已揭露出皇城台门址及东护墙北段上部及台顶大台基南护墙，是石峁最核心的工程区域，作为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的早期宫城，皇城台层层设防、众星拱月般的结构奠定了中国古代以宫城为核心的都城布局。

皇城台门址由广场、瓮城、南北墩台、门塾等组成。广场由基本平行的两道石墙围成，平面呈长方形，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在外瓮城外侧的墙根处，发现完整玉钺两件。门道内为石板铺砌的路面，陡坡状攀升至台顶，路面的部分石板上发现阴刻“符号”。最新考古发掘中，门址和东护墙北段上部出土的陶、骨、石、玉、铜等各类遗物数以万计。皇城台发现的制作铜器的石范，为国内已知最早的铸铜遗存之一；陶瓦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国内数量较大、区域位置最北端的发现，暗示着台顶存在着覆瓦类高等级建筑；“弃置堆积”

中出土的万余枚骨针以及“制作链”各阶段的相关遗物，暗示着皇城台顶部可能存在着大型制骨作坊。皇城台还出土有不少于20件的骨制口簧，口簧在现代被叫作“口弦琴”，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年代最早的口簧。2018年在台顶发现了的几代人就几乎没有停止过在遗址上进行调查、勘探、发掘、研究，才形成一张比较宏观的图。很多上级领导到陕西省考古博物馆考察时，我都会讲解说，挂在墙上的一张图、图上的每一个点背后，都有一群人在那里工作了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

（二）外城东门址  
外城东门址是石峁遗址全面揭露的第一处

重要遗迹，由内外瓮城、南北墩台、门塾等设施组成，周边地层及遗迹中出土了玉铲、玉钺、玉琮、牙璋、陶器、壁画和石磨头像等重要文物。

外城东门一带石墙内埋葬玉器的现象尤为引人注目。根据其出土状况分析，这些玉铲、玉钺、玉琮等器物应是城墙修建过程中有意嵌入墙体的。石磨遗址所见将玉器置于墙体之内的现象，或符合上古文献或神话中提到的玉门、瑶台、璇门的相关记载。作为石峁人在信仰层面的驱鬼辟邪观念催生的精神武器，石磨外城东门址所见杀戮奠基及墙体藏玉现象，极

大满足了辟邪神话寄托及“宗教中心”的向心功能，也成为其凝聚周边中小型聚落的核心手段。外城东门址是中国史前城址上规划最为复杂、设施最为齐备的实例，设计精巧、结构复杂、装饰华丽，筑造技术先进，被誉为“华夏第一门”。

### （三）韩家圪旦居址与贵族墓地

韩家圪旦居址石峁城址内城的一处居址，出土陶、骨、石器千余件。韩家圪旦居址的墓葬多为竖穴土坑墓，规模在2平方米以上，最大者长约4米，宽约3米，深6米，墓室面积12平方米；最小则仅可容身。规模差异显而易见。

韩家圪旦居址早期作为居址使用，晚期考古研究时居址废弃，作为墓地使用，聚落功能发生了巨大的更替。虽然该墓地被严重盗扰，但仍然从规模上能够判断其为石峁遗址内的一处大型贵族墓地，墓地主人出现了身份差异及等级区分，社会复杂化倾向加剧。

### （四）樊庄子哨所

樊庄子哨所位于石峁城外的东南方向，与外城南墙上的一处城门隔沟相望，与外城城墙直线距离约300米。哨所系在自然土崖顶部垫土找平后修筑石砌建筑。石砌建筑可分为内外两层“石围”，内围位于山崖顶部正中，平面大致呈东西向长方形，长约14米，宽约11米。除外墙外，其余三面墙体保存比较完整。根据方形石围内侧均匀分布的壁柱槽分析，或应为一座用于支撑的“穹顶”的壁柱槽，其功能或与登高望远瞭望哨有关。樊庄子哨所与其他四座同类遗址共同构成城外的“预警系统”。

（口述：孙周勇 整理：司晋丽）

### 链接